

8~9世纪吐蕃入迁河西及其影响

黄兆宏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历史系, 甘肃 兰州 730070)

[关键词] 吐蕃; 入迁河西; 影响

[摘要] 河西地区在吐蕃统治的 80 余年间, 除了吐蕃自身在这里较多地接触到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之外, 更重要的是吐蕃对迁入地的影响, 即出现了吐蕃化的现象。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是吐蕃采取强制政策的结果; 同时, 在吐蕃入迁河西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以藏语言命名的地名。

[中图分类号] K281.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003(2008)06-033-06

今甘肃河西走廊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特殊的自然条件, 在历史上成为中原通往西域、中亚以及欧洲的必经孔道, 也是中国西部民族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 同时也成为古代各民族文化交流大舞台。本文拟就吐蕃入迁河西的情况及其影响作一简要的探析, 敬请方家指正。

一、吐蕃对河西地区的占领

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 因政治和军事的需要, 河西道从陇右道中分离出来, 成为独立的行政区划单位。分治后的河西道领凉、甘、肃、瓜、沙、伊、西 7 州。除了伊州和西州以外, 其他 5 州均在今河西地区。

关于吐蕃对河西地区的占领情况, 《旧唐书》、《新唐书》、《通典》、《元和郡县图

志》、《资治通鉴》、《文苑英华》等史籍都有所记载: 早在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 吐蕃就曾染指过凉州, 如《新唐书·吐蕃传》云: “帝曰: ‘吐谷浑与吐蕃本甥舅国, 素和贵叛其主, 吐蕃任之, 夺其土地, 薛仁贵等往定慕容氏, 又伏击之, 而寇我凉州, 何邪?’”^[1] 仪凤二年(677年), 吐蕃寇凉州。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 吐蕃寇凉州, 都督许钦明死之。久视元年(700年)秋, 吐蕃大将鞠莽布支率骑数万寇凉州; 次年, 与突厥联合“大入河西”。开元十四年(726年), 吐蕃将悉诺罗领兵攻甘州; 次年, 陷瓜州。遂攻玉门军, 围常乐; 次年, 攻至瓜州城及祁连城下。开元二十六年(738年), 吐蕃大入河西。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 因驻守河陇等地的唐朝镇戍官兵相继调回关中抵御安禄山叛军, 吐蕃乘虚而入, 先攻占陇右各州, 然后

[收稿日期] 2008-05-21

[作者简介] 黄兆宏(1965-), 甘肃平川人, 博士、副教授, 主要从事隋唐史及西北文明史研究。

攻河西诸州。具体时间是:广德二年(764年)攻占凉州,永泰二年(766年)占甘州、肃州;大历十一年(776年)攻占瓜州,建中二年(781年)陷沙州。^[2]至此,今河西地区尽为吐蕃所有。

吐蕃进攻沙州的情况,在出土的吐蕃简牍中也有所反映。《吐蕃简牍综录·军事条》云:“酉年春,沙州……萨毗地区,作阻击敌军之军事准备……军队和……此时,遵照命令,立即给以奖赏……”^[3](笔者按:萨毗是吐蕃统治敦煌一于阗一线时一大行政区划名称^[4])据《寿昌县地境》记载:“萨毗城,在镇城东南四百八十里。其城康艳典置筑,近萨毗城泽险,恒有土(吐)蕃土(吐)谷[浑]贼往来。”^[5]根据简文的内容,似是吐蕃军在进攻沙州、萨毗前所做动员准备工作,如果攻下沙州、萨毗等城,可以得到奖赏。“酉年”,具体时间不太清楚,但据前面所讲吐蕃攻占沙州的时间看,这条简牍资料当反映吐蕃攻占沙州11年中的某一年所发生的事情。

吐蕃对河西地区的占领情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之《大事记年》和《赞普传记》中亦有记载,《大事记年》中第78条云:及至兔年(玄宗开元十五年,丁卯,724年)“攻陷唐之瓜州晋昌”;^[6]第107条云:及至狗年(肃宗乾元元年,戊戌,758年)“论·墀桑、思结卜藏悉诺囊等引劲旅至凉州城。”^[7]第113条云:“(上残)……赞普从宫内……(论)盐州、悉诺穷桑在瓜州城时,城内驻守之唐廷官员高德来会见甘州,谈话如下:吐蕃引兵进攻过去盟誓中声言不应侵扰之地,往昔,盟誓中曾声言将于恪守诺言,却未付诸实践,我等也不再向蕃地输赋,今后应恪守誓言。赞普驻于‘拉格’严饬以上二论……(下残)”;^[8]

《赞普传记》中记载:在赤德祖赞赞普时(704~754年在位)“大论达札恭禄及诸小邦王子大臣一致同意后,赞普亲自出征,于唐境推行政令,攻陷唐之瓜州等城堡。彼时,唐朝国威远震,北境突厥等亦归聚于唐,(西)直大食国以下均为廷辖土,唐地财富丰饶,于西部(上)各地聚集之财宝贮之于瓜州者,均在吐蕃攻陷之后截获,是故,赞普得以获大量财物,民庶、黔首普遍均能穿着唐人上好绢帛矣。”^[9]

二、吐蕃向河西地区的迁入

伴随着吐蕃对河西地区的战争及占领,吐蕃人开始移居河西。如尚乞心儿,吐蕃大相,一直负责管理吐蕃东军事务。在吐蕃军攻取沙州后充任第一位沙州吐蕃长官,据P T 1070号背面的汉文文书《大蕃勅尚书令赐大瑟瑟告身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中记载,他“爱乃卜宅敦煌古郡,州城内建圣光寺一所”。表明他已将敦煌作为定居之地。

一般百姓移居河西地区的情况,在敦煌出土文书中亦有所反映。据S 5824号《经坊供菜关系牒》记载:

1. 应经坊合请菜蕃汉判官等。
2. 先子年已前蕃僧五人,长对写经二十五人。
3. 僧五人,一年合准方印得菜一十七驮,行人部落供。
4. 写经二十五人,一年准方印得菜八十五驮,丝绵部落供。
5. 昨奉处分,当头供者,具名如后:
6. 行人大卿小卿乞结夕遁论磨判罗悉鸡张荣奴、张子,
7. 索广奕索文奴阴兴定宋六六尹齐

兴 蔡殿殿 康进建

8冯宰荣 宋再集 安国子 田用用 王尊,
已上人,每日得三十二束。

9丝绵苏南 觸腊 翟荣胡 常弁 常闰 杨
谦让 赵什德

10王郎子 薛卿子 娑志力、勃浪君君 王
□□ 屈罗悉鸡 陈奴子

11摩悉獵 尚热磨 苏儿 安和子 张再
再,已上人 每日得三十三束。

12右件人准官汤料合请得菜请处分。

13牒件状如前 谨牒。

(后缺)^[10]

文书中之“行人部落”、“丝绵部落”,是吐蕃在沙州设立的汉人部落,但其中的乞结夕、判罗悉鸡、娑志力、尚热磨、勃浪君君、屈罗悉鸡、摩悉獵、尚热磨等,显系吐蕃人名,这说明在汉人部落中杂有相当数量的吐蕃移民。

还有一些敦煌出土文书提到的人名,如 S 2729《吐蕃辰年(788年)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辩牒》中的“论悉诺罗按谟”; P 5579中的“论乞颊”、“尚乞心儿”、“论勃颊”; S 2703的“勃论啜”; S 2770的“尚论”; S 3287的“论悉殉夕”等,这些人显然亦系吐蕃人名。可见,在入迁河西地区的吐蕃人中,既有高级官吏,也有普通百姓。

反映吐蕃人入迁河西地区的资料很多,现再举几例予以说明:

大中四年(850年),原驻鄯州吐蕃大将尚婢婢,为论恐热所击败,尚婢婢则“率部落三千余人就水草于甘州(治今张掖市)西”。^[11]

《张淮深变文》载:“敦煌虽百年阻汉,没落西戎,尚敬本朝,馀留帝像。其於(馀)四

郡,悉莫能存。又见甘、凉、瓜、肃,雉堞雕残,居人与蕃丑齐肩,衣著岂忘於左衽;独有沙洲一郡,人物风华,一同内地。天使两两相看,一时垂泪,左右驂从,无不惨怆。”^[12]

9世纪中叶,吐蕃在河陇的统治瓦解后,其部落分散各地。《宋史·吐蕃传》载:“唐末,瓜、沙之地复为所隔。然其国(吐蕃)亦自衰弱,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13]

五代时,在凉州,无论城内或城外,居民以吐蕃人为主。《宋史·吐蕃传》载:“天成(926~930年)中,权知西凉府留后孙超遣大将拓拔承海来贡,明宗召见,承海云:‘凉州东距灵武千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旧有郅人二千五百为戍兵,及黄巢之乱,遂为阻绝。超及城中汉户百余,皆戍兵之子孙也。’”而“凉州郭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余皆吐蕃”。^[14]

后晋天福三年(938年),高居诲奉命出使于阗,沿途所见,“自灵州渡黄河至于阗(今新疆和田),往往见吐蕃族帐,而于阗常与吐蕃相攻劫”。^[15]从灵州到于阗,绝大部分路程是在今河西地区经过。可见吐蕃人在河西的确不少。从以上所举例证,我们可以看出,在河西地区确有很多吐蕃人迁入。

三、吐蕃对当地民族的涵化

所谓“涵化”,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化体系间持续接触、影响而造成的一方或双方发生的大规模文化变异”。^[16]一般来说,人数少的群体容易被大的群体所涵化,经济文化先进的民族涵化较落后的民族,统治民族涵化被统治民族。同时迁徙的少数民族对迁入地影响力的大小,一般还取决于移

民数量的多少和时间的长短,“如果移民数量过少,那么移民一般会被迁入地的文化所同化。如果移民数量很大,且移居时间较长,则必然会引起迁入地文化的改变”。^[17]

河西地区在吐蕃统治的80余年间,除了吐蕃自身在这里较多地接触到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之外,则更重要的是吐蕃对迁入地的影响,即使迁入地出现了吐蕃化的现象,也就是说吐蕃对当地民族的涵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政治机构吐蕃化。吐蕃占领河西地区后,设置了一整套从原居地演变而来的官僚体制机构,涉及行政、军事、司法、经济、佛事等方面。如吐蕃在瓜州地区所设置的行政机构序列表现为:瓜州节度使——乞律本——节儿、监军、都督、都部落使——部落使、监部落使、乡官,这些机构明显带有吐蕃化的特征。

第二,推行同化政策。吐蕃进入河西地区以后,其统治对象除其他少数民族外,主要是汉民族。吐蕃对广大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实行了同化政策,使河西地区一时出现了吐蕃化的倾向。据史载,吐蕃陷河陇后,“州人(指沙州)皆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18]张籍的《陇头行》诗也谓:“陇头路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汉兵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地。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谁能更使李轻车,收取凉州入汉家。”^[19]白居易的《缚戎人》诗则描述更为具体生动:“白云乡管本凉原,大历年中没落蕃。一落蕃中四十载,遣著皮裘系毛带……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另外,在出土于敦煌文书中也载道:P·

3415《张淮深变文》云:“天使睹往年御座,俨若生前,叹念敦煌虽百年阻汉、没落西戎,尚敬本朝,余留帝像。其于(余)四郡、悉莫能存,又见甘、凉、瓜、肃。雉牒彫残,居人与蕃丑齐肩,以着岂忘于左衽。”这些事实说明,吐蕃统治河西地区时,实行涵化政策。

由于吐蕃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在河西地区出现了下列现象:司空图《河湟有感》诗云:“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20]王建《凉州行》诗云:“凉州四边沙皓皓,汉家无人开旧道。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万里人家皆已没,年年旌节发西京。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著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养蚕缲茧成匹帛,那堪绕帐作旌旗。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21]诗中的“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一半生男为汉语”,是吐蕃推行同化政策所产生的影响的具体反映。

另外,敦煌莫高窟156窟南壁有一幅《张议潮出行图》壁画,图内前列欢迎人群中有一对穿吐蕃服装、作吐蕃舞蹈动作的两对人,这两队人实际是被吐蕃化了的汉族人。^[22]

第三,吐蕃的语言文字在河西地区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吐蕃化的倾向。这从敦煌所发现大批藏文文书中可以得到证明。伯希和编号3419号《千字文》是一本用藏文注写汉籍的“注音本”,编号为1228、1231号等写卷则是汉藏文字书写的对照词汇。这些写卷的发现,不仅体现藏文在敦煌民间广为流行使用,同时提供了吐蕃推行同化政策的证据。

据上可知,由于吐蕃推行同化政策,使得

吐蕃涵化了当地的其他民族,从而使河西地区也成了以吐蕃居民及其文化为主体的吐蕃文化圈。

四、从地名来看吐蕃入迁河西地区

地名作为语言的活化石,是研究民族分布及其迁徙的重要依据。历史上,河西走廊为多民族、多部落分布地域,民族变动极为频繁,不同民族都曾以自己的语言命名过地名。在吐蕃入迁河西的过程中也留下了大量带有吐蕃语言特征的地名。例如在《宋史》中多次出现的西凉府“六谷族”,其首领潘罗支、厮铎督执掌过凉州吐蕃政权。这些六谷族为吐蕃部落,因游牧于武威南山6条河谷而得名。这6条河流自东而西次第为古浪河、黄羊河、杂木河、金塔河、西营河、东大河,其中古浪、杂木、东大均为藏语。古浪,原为古孜浪尔,即黄羊川,意为黄羊很多之意;杂木河,源于藏语杂而木,意为古崖水;东大河藏语名为“江帐”,汉译为蹇占,其意为长城或长墙。这6条河谷至今下游为农业区,上游是牧场,表明自古至今这6条河流上游一直为游牧民族活动之区域。可见这一带为吐蕃人分布集中之地。另,今永登县的庄浪,金昌市的锦羊岭,也均为藏语地名。庄浪,藏语意为“野牛沟”;锦羊岭,藏语译音,意为“高峻的山岭”。据研究,今张掖市马蹄寺石窟群中的“马蹄”,则是以吐蕃部落的一支马蹄部而命名的。马蹄即马蹄山,故名临松山。前凉张天锡时,曾于临松山下设置临松郡,北魏时也在这一带设置过临松郡。临松山改称马蹄山有不同说法。据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编纂的《甘州府志》称:“岩间有神骏足迹”,“薤谷中,以上有马足夹,俗名马蹄寺。”即马蹄一

词来源于岩间的马蹄印。后来在清同治四年(1685年)成书的《安多政教史》和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编纂的《民乐县志》都沿用此说;现存马蹄寺内的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重修马蹄寺记》记载:“甘镇城南百里许,有祁连山,又名雪山。山腰建寺,曰马蹄。”后来经过演绎,并加以神话,此马蹄成为天马所践的砂石足印,成为马蹄寺一景。上述两种说法实无根据。

另据《太平寰宇记·陇右道(三)·甘州条》记载:“临松山,一名青松山,一名马蹄山,又云丹岭山,在县南一百二十八里。《十六国春秋》晋元嘉元年,张掖临松山有石如‘张掖’字,后‘掖’字渐灭,而‘张’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四方安万年’。后魏太和中置临松郡,故城在此山下,吐蕃赞普即其郡丞异称也。故望山有神,每祀之时,但闻声音,不睹其形。”^[23]在这里“吐蕃赞普即其郡丞异称也”值得注意,我们可以理解为马蹄是驻牧在临松山一带吐蕃一支部落的名称,后来以族名称之。《太平寰宇记》成书于北宋雍熙三年(983年),其记载当为可信。

吐蕃对河西地区的战争、占领及吐蕃人入迁河西后对汉族及其他民族居民的“涵化”等,虽然早已成了历史烟云,不过,吐蕃人入迁河西地区后的历史活动的印迹却至今仍存,诸如敦煌遗书中藏文文书的保存、部分藏语地名由汉族及其他民族持续使用、部分藏族长期同河西汉族及其他民族毗邻居住等,尤其是当年沙州都知兵马使阎朝降吐蕃绮心儿时,双方以“苟毋徙佗境,请以城降”为约言,事后,绮心儿也未曾食言,所以出现了吐蕃人与汉族人及其他民族间相处80余年的现象,自然这些历史现象都是值得积极

评价的。

[参考文献]

- [1][18] (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 [M]: 卷 216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6076, 6101.
- [2] (唐)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 [M]: 卷 40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025.
- [3][4]王尧、陈践编著. 吐蕃简牍综录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45, 32.
- [5]郑炳林. 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 [M].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1989: 61.
- [6][7][8][9]王尧、陈践译注.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增订本)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2: 152~166. 黄布凡、马德译注. 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 [M].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0: 51~58.
- [10]唐耕耦、陆宏基.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第2辑) [M]. 北京: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0: 412.
- [11] (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 [M]: 卷 249 北京: 中

华书局, 1956: 8043.

- [12]王重民等编. 敦煌变文集 (上册)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121~128.
- [13][14] (元)脱脱等. 宋史 [M]: 卷 492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4151~14152.
- [15] (宋)欧阳修.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于阗 [M]: 卷 74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919.
- [16]林耀华主编. 民族学通论 (修订本)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7: 397.
- [17]薛平拴. 陕西历史人口地理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411.
- [19][20][21] (清)曹寅等编. 全唐诗 [M]: 卷 382, 633, 298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4284, 7261, 3374.
- [22]陈守忠. 公元八世纪后期至十一世纪前期河西历史述论 [J]. 西北师范学院学报, 1983 (4).
- [23] (宋)乐史. 太平寰宇记 [M]: 卷 152.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470册): 434~435.

Tubo Moving into Hexi and its Impact in the Eighth to Ninth Century

HUANG Zhao-h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Keywords: Tubo moving into Hexi; impact

Abstract: In the duration of Hexi governed by Tubo regime over eighty years, Tibetans accessed to advanced economy and culture of Central Plains in this area and the impact of Tubo regime in the area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hat is a phenomenon of Tibetan culture being dominative position gradually. At the same time, they left large amount of place names in their language in the process of moving into Hexi.

[责任编辑: 刘红娟]